

# 伪满留日学生的在日生活\*

徐志民

**提要:**关于伪满留日学生的在日生活,有学者访谈过一些原伪满留日学生,但彼此所谈留日生活差异较大,往往彰显了个人留日生活的特殊性。抗战时期,日本不仅安抚和“保护”伪满留日学生,而且专设学席制度,与其他伪政权相比貌似优待伪满留日学生。其实,这是日本企图吞并中国东北和实施“以华制华”“分而治之”侵华政策在留日教育层面的反映。伪满留日学生的学习、交往和日常活动同样被监控,任何“异常”都可能招致牢狱之灾或杀身之祸,这也是他们留日生活的常态和底色。因此,伪满留日学生个人留日生活的特殊性蕴含在普遍性之中,如此理解他们的留日生活或许更加客观。

**关键词:** 抗日战争 伪满洲国 留日学生 留学生活

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不仅群体庞大,而且在中国近现代史和中日关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因而颇受学界关注,相关成果比较丰硕。但是,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主要集中于清末民初,直到20世纪90年代逐渐转向抗战时期。即使如此,中日学界也是侧重抗战时期中国学生围绕“留日”如何出国的历史和学成之后的回国史,至于他们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史关注不多。河路由佳、周一川、刘振生等学者访谈过一些原伪满留日学生<sup>①</sup>,涉及他们在日本的留学生活,但由于每个人的家庭出身、个体境遇、留日记忆、战时体验、战后经历等不同,导致所谈的留日生活有所不同,往往突出了个人体验的特殊性。笔者曾专门探讨过抗战时期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生活,但主要针对的是关内留日学生<sup>②</sup>,而对伪满留日学生的在日生活由于当时资料所限一笔带过。随着笔者转向伪满留日学生研究,查阅了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国立公文书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及个别院校的档案与文献,拟考察伪满留日学生在日生活的普遍性,探讨日本如何对待在中国扶植的首个傀儡政权“满洲国”的留日学生及其目的,思考留学生活与日本侵华政策的深层关系,从而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 一 蛊惑留日与战时安抚

其实,早在九一八事变和扶植伪满洲国之前,对中国东北觊觎已久的日本就在当地悄悄开展文化侵略和殖民教育活动。1905年,日本先在美国斡旋下与俄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后逼迫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中国抗日战争志》(项目编号:16KZD021)、沈阳英雄城市塑造专项重大课题“沈阳抗战基本内容和历史地位研究”(项目编号:YXCS2022-01-02)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河路由佳、淵野雄二郎、野本京子:『戦時体制下の農業教育と中国人留学生:1935—1944年の東京高等農林学校』、農林統計協会、2003年;浜口裕子:『満洲国留日学生の日中関係史——満洲事変・日中戦争から戦後民間外交へ』、勁草書房、2015年;見城悌治:『戦時下日本における『満洲国』留学生たちの『修鍊』活動——『満洲国』留日学生会会報から見る日本体験の一側面』、千葉大学『人文研究』第46号、2017年3月;周一川:『近代中国人日本留学の社会史——昭和前期を中心に——』、東信堂、2020年;孔凡岭:《伪满留日教育述论》,《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刘振生:《近代东北人留学日本史》,民族出版社,2015年;陈珂琳、陈秀武:《日华学会的伪满留日学生管理与实践》,《近代中国东北与日本》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等。

② 参见徐志民:《敌国留学——抗战时期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实态》,《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

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攫取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殖民权益。1906年6月，日本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在满铁附属地开始殖民侵略和教育活动。一是创办传授日语或实业技能培训的学校，如铁岭日语学校、抚顺矿山学校、公主岭农业学校、辽阳商业学校等；二是资助一些具有前述功能的私立学校，如资助辽阳日语学校、海城东语学舍、吉林中日语言学校、安东中日恳亲学堂、鞍山公学堂、奉天同文商业学校等；三是向辽阳县立模范高等小学堂选派日本教师，提供日语教育支持。<sup>①</sup>其目的是既养成满铁所需的专业技术人才，更培育所谓中日“相互理解”“共存共荣”的“善良国民”。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大多入职日方相关单位或升入日本各类学校。1917年3月，满铁创办的南满中学堂几乎成为留日预备学校<sup>②</sup>，就反映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学生留日的准备和对他们配合日本侵华政策与行动的某种“期许”。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教育渗透和蛊惑青年学生赴日留学，引起中国人警惕和反感。20世纪20年代中国爆发全国范围的“收回教育权运动”。1924年7月3日，时任满铁理事松冈洋右致函关东厅外事部部长山崎平吉，一方面指责中国的“收回教育权运动”是对日本在华教育活动的“误解”，另一方面不得不改进满铁附属地的教育设施，在教科书内容和教育训练方法上进一步适应中国人的“学习环境”<sup>③</sup>。中国驻日大使馆也关注日本在东北蛊惑青年留日的阴谋，秘密向国民政府报告并提请注意。1929年4月，驻日大使馆向国民政府秘密报告：日本人在黑龙江甚至内蒙古一带，以“援助”求学为名劝诱当地人赴日留学，赴日后，便以各种方法培养他们亲日反华思想，“颇有阴谋”<sup>④</sup>。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大批中国留日学生愤而回国，抵制日本侵华行动。从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看，九一八事变前中国留日学生约3000名，而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后迅速降至约1000名，减少2/3左右。东北出身的在日留学生，在事变前约有600名，到事变后的1932年和1933年初只有300余名<sup>⑤</sup>，反映他们不愿再度留日的悲愤心境。

面对战火纷飞、音信断绝、汇款不济而陷入困境和恐惧之中的中国东北留日学生，日本政府决定采取安抚与“保护”措施。1931年9月28日，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部长坪上贞二致电宫城县知事汤泽，指出由于出身宫城的第二师团在中国东北作战，而在宫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时刻感受到威胁，请其对留日学生予以“保护”。外务省与文部省还达成协议，通过留日学生就读的各校校长发出告示，表示无论如何绝不危及中国留日学生的生命财产安全，请他们此际“自重”“学

① 参见「10. 満鉄附属地ニ於ケル支那人教育施設ニ関スル件」、『支那ニ於ケル文化事業調査関係雑件/外国人ノ文化事業』第二卷、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50160749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② 参见徐志民：《满铁与留日教育——以南满中学堂为例》，《东北师大学报》2017年第4期。

③ 参见「10. 満鉄附属地ニ於ケル支那人教育施設ニ関スル件」、『支那ニ於ケル文化事業調査関係雑件/外国人ノ文化事業』第二卷、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50160749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④ 参见《日人引诱蒙人来东留学》，转引自王奇生：《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52—253页。

⑤ 参见周一川：《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考辨》，《文史哲》2008年第2期；「10. 本邦留学支那人増加ニ関スル件」、『在本邦中国留学生関係雑件』、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40113584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习”，“达成留学的目的”<sup>①</sup>。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也呼应日本政府对伪满留日学生的安抚措施。同年7月，伪满文教部发布通告，规定此前东北的各种官费留日学生，凡在9月10日前到伪满驻日留学事务处登记报到者，继续发给学费。<sup>②</sup>伪满希望通过继续补助南京国民政府选派的东北籍公费留日学生或原东北地方政府选派的公费留日学生以拉拢他们，但并不自信这些留日学生会“效忠”自己，故同时决定“自行”考选留日学生。经伪满文教部总务司司长西山政猪、学务司司长上村弥哲等与日本文部省、外务省等协商，伪满文教部于1933年3月举行首届“部费”留学生考试，录取119人。此后，伪满文教部几乎每年选取百名内外的“部费”留学生，除极少数派往已承认伪满的德国外，绝大多数派往日本。<sup>③</sup>伪满政权还根据现实需要或日本侵略者要求，选派了一批又一批的警察、教师、社会指导者、官吏、陆海军士官生等各类留日学生。例如，1934年伪满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和伪满吉林省省长兼财政大臣熙洽在“访日谢恩”回国后，即通过内蒙古各蒙旗的“旗产”资助一些蒙古族学生赴日留学，是为“旗费”留日学生。其他还有伪满军政部出资的“军费生”，实业部出资的“实费生”，民政部出资的“民费生”，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出资的“文费生”，满铁出资的“满费生”<sup>④</sup>，以及日本宫内省、善邻协会等资助的留日学生等。同时，东北的一些富商大贾、军阀官僚、地主汉奸也纷纷主动派遣子弟赴日留学，以希攀附日伪政权，或走向卖国求荣的“飞腾”之路。这也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前夕，伪满留日学生增至2017名<sup>⑤</sup>，达到伪满留日学生人数高峰的重要原因。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为“挽留”和安抚在日本的伪满留日学生与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日本政府联络各校，要求密切关注所谓“满”中留日学生的动向，并提供相应的关照和“辅导”。同年8月3日，文部次官伊东延吉致函外务次官堀内谦介，通报随着七七事变爆发，他已经通知日本各校校长及各地方长官，要求各教职员对“满”中留日学生保持大国国民的胸襟气度，与他们相处时“谨言慎行”，避免刺激他们，使之安心留学，同时充分关注其“动向”，及时报告暑假期间是归国还是在留，对在留者做好“辅导”。10月3日，伊东延吉通知各校，对七七事变爆发后回国留日学生的“逾期不归者”给予休学便利，即使未缴纳学费也暂时保留其学籍。<sup>⑥</sup>这种对留日学生的安抚政策，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稳定留日学生的情绪，吸引部分留日学生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仍留在日本继续求学。当时受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波及相对较小，且作为日本“盟国”而享受相对优待的伪满留日学生的人数变化不大就是一个证明。

## 二 相对优待与强化辅导

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建立至1937年七七事变期间，日本政府和军部将中国留日学生人为

① 「18. 満洲事変ニ関連中国人保護方宮城県知事へ依頼 自昭和六年九月」、『参考資料関係雑件/学校及学生関係』第一巻、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50160981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② 参见赵卜谦：《留日学生纪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吉林文史资料》第26辑，1988年印；武强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二），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448—450页。

③ 参见王奇生：《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第258页。

④ 参见刘振生：《“满洲国”時代における元日本留学生と日本》，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96页。

⑤ 参见周一川：『近代中国人日本留学の社会史——昭和前期を中心に——』、53頁。

⑥ 参见「満支両国人学生生徒ノ取扱ニ関スル件 十二年十月」、『在本邦選抜留学生補給実施関係雑件/方針関係』第二巻、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50154757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地分为“满洲国”留日学生和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即使七七事变后，日本在中国其他占领区扶植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伪蒙疆政权，以及主要整合前两者而成立的汪伪政权，也各自选派赴日留学生。这些留日学生虽与伪满留日学生无本质区别，但日本培养其目标是“日华亲善”的基石人才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而伪满留日学生被日本寄予“日满融合”的期望，体现了日本妄图吞并中国东北的侵略野心与战略目标。基于此，日本对伪满留日学生相较于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和其他伪政权留日学生更为“优待”。伪满洲国成立时，日本各校决定“满洲国学生放假一日”，日本的一些饭店贴出告示：“本日半价招待满洲国留学生”，甚至留学生居住的公寓的主人向伪满留日学生鞠躬“道贺”。<sup>①</sup> 这些如其说是“优待”，不如说是赤裸裸的侵略与挑拨。因而，伪满留日学生大多侧目而过。

日本政府还通过对伪满留日学生发放临时学费补助、增加一般补给生和选拔补给生名额等方式，扩大资助范围，显示与对待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不同的特殊“优待”。<sup>②</sup> 1933年2月10日，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部长坪上贞二致函东京帝国大学校长小野塚喜平次等29所学校的校长，要求调查接受该部补给的伪满留日学生是否又接受伪满官费汇款；若有接受，则接受多少数额的官费汇款；学校对这类官费汇款是全数交付还是代为保管？指出伪满留日学生领取过多之学费补助既对“修学不利”，也导致学费困窘者增多，要求尽量避免重复领取学费补助的不公，进而扩大资助学生的范围。<sup>③</sup> 1933年度开始，外务省文化事业部以保障最低学费为目标，为使尽可能多的留日学生“沐浴其恩典”，先将原本一般补给生的每月70元、选拔补给生的每月50元统合一起，然后按伪满留日学生就读学校所属地区分为甲、乙地区，其中甲地区指东京、大阪、京都、横滨、神户，乙地区指除甲地区外的日本其他地方，规定就读于甲地区大学、专门学校、高等学校的医工理农各科者，每月分别补助60元、50元、40元，就读于其他各科者分别补助55元、45元、40元；就读于乙地区大学、专门学校、高等学校的医工理农各科者，每月分别补助55元、45元、35元，就读于其他各科者分别补助50元、40元、35元。<sup>④</sup> 若不论其主观意图，至少客观上确实使更多的伪满留日学生接受了学费补助。

获得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学费补助的伪满留日学生，不仅要及时、详细地报告自己归国、返日、放假、返校、研究等一切活动的具体日期，以及有无迟到、接受其他学费补助等情况，而且还有其他一系列要求与规定。如补助期满后若想继续接受补助，需要准备相关研究机构的公函、本人的申请书及履历书、详细的学业成绩表、自己的研究题目和研究方法等，向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提出继续补助申请。再如，从高中升入大学、从专门学校毕业后升入同一系统的上级学校、从大学或专门学校毕业后需要进一步研究或实习时，根据留日学生的成绩和考虑其研究题目、研究方法、研究机构等，原则上许可继续补助；对于前述之研究实习，以医工理农各科为限，其他各科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再给予补助，从大学到大学、从专门学校到专门学校、补助期满超过半年

① 参见王奇生：《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第254页。

② 参见「1. 満洲事変地域出身留学生ニ学費臨時補給昭和七年一月」、『在本邦留学生ニ対スル諸補給關係雜件』第二卷、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50155341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1. 満洲国留学生ニ対シ給費制度ニ関スル件 昭和八年一月」、『在本邦留学生關係雜件』第九卷、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50154061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③ 参见「3. 満洲国出身補給生ノ学費ニ関スル件 昭和八年二月」、『在本邦留学生關係雜件』第九卷、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50154063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④ 参见「24. 満支留学生ニ対スル事務処理方 昭和十一年四月」、『在本邦留学生關係雜件』第八卷、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50154055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者，均不得继续补助。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对伪满留日学生在日本的修学旅行，原则上留学期间资助一次，每名学生固定补助70元，指导者固定补助120元，要求最晚在旅行出发前两周提出申请。<sup>①</sup>1934年，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就资助每名伪满留日教员日本“视察补助费”70元，鼓励他们到日本内地参观和交流，认为这对日“满”两国的将来大有“益处”。<sup>②</sup>1935年6月，外务省对需要开展流动性研究的伪满留日社会指导者，决定支付每名250元“视察旅费”<sup>③</sup>，这既因为流动性研究需费用较多，也反映了日本对维护殖民统治的社会指导者更加重视和寄予“厚望”。

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和1938年学席制度运行，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对伪满留日学生的学费补给制度和学业、人数统制形式也发生较大变化。中日两国从1924年合作推出一般补给生制度，在1930年因日本拒绝全数返还庚款而名存实亡。<sup>④</sup>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利用伪满驻日机构推荐一般补给生，仍然保留和“活用”一般补给生制度，配合其独自推行的选拔补给生制度和特选补给生制度，并从1933年度整合一般补给生制度和选拔补给生制度，扩大资助伪满留日学生范围。随着1938年日本部分学校为伪满留日学生保留固定的学席名额，原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资助伪满留日学生的经费，转而用于资助日本各校为伪满留日学生保留学席的费用。不过，1939年开始的“日满文化学会”补助费生与“满洲矿工技术员协会”补助费生到1940年被归入公费生，1941年开始“满洲帝国教育会”贷费生。由于外务省文化事业部补给生的消失而使补助费生减少的倾向，随着各类补助费生的出现和增加，使接受各种补助经费的伪满留日学生总人数并无太大变化。据统计，从1938年至1942年，接受经费资助的伪满留日学生每年保持300人以上。<sup>⑤</sup>

伪满留日学生接受相对优待的经费补助和学席名额时，也不得不接受日伪在日常学习和思想领域的强化辅导。1934年2月，“满洲国协和会”在《财团法人日满学会设立计划案》中，明确了设立“日满学会”的主要目的是“辅导‘满洲国’留日学生”。该“计划案”指出现有在日的伪满留日学生400名，推断年中可达600名，但这些留日学生大多分散居住在专门为中国人开设的出租屋内，而这些以营利为目的的出租屋，导致“他们无法沐浴日本的精神文化，对于满洲建国毫无认识，也不知心存感激”；他们与中华民国学生同居，且人数较少，出于从众感而大多受民国青年的三民主义“偏见”的影响，如此下去“新国家的这些中坚人物将失去指导国家的资格，因而对他们进行辅导非常必要”<sup>⑥</sup>。那么，如何对伪满留日学生进行辅导？即：1. 充分考虑对伪满留日学生与中华民国留日学生“辅导”的截然不同；2. 重视精神教育，特别是宣扬新国家的“建国”意义，着眼于培养新国家“中坚力量”的素质。伪满留日学生的辅导机构，

① 参见「24. 満支留學生ニ対スル事務処理方 昭和十一年四月」、『在本邦留學生關係雜件』第八卷、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50154055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② 参见「7. 文教部派遣留學生補給自昭和八年 分割1」、『満洲国文教部派遣留學生關係雜件』第一卷、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50155682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1. 第一回文教部派遣教員留學生 昭和九年五月」、『満洲国文教部派遣留學生關係雜件』第一卷、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50155676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③ 参见「34. 満洲国派遣社会教育指導者内地視察旅行補給 昭和十年二月」、『在本邦留學生本邦見学旅行關係雜件/補助実施關係』第八卷、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50158308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④ 参见徐志民：《日本政府的庚款补给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3期。

⑤ 参见周一川：『近代中国人日本留学の社会史——昭和前期を中心に——』、89—90頁。

⑥ 参见「十四、日滿学会設立計画案 及び 十五、康徳元年度工作方針」、『満洲帝国协和会史料 协和会史資料集 第5集 帝制實施前後』、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12120180300、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

由伪满政府、满铁、协和会，以及日本驻伪满公使馆、外务省、关东军、文部省等先组建筹备委员会，而后正式成立“日满学会”。该学会一方面从事伪满留日学生“辅导”，另一方面开办学塾、日语学校等文化事业，其经费主要来自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日本政府和军部实际控制下的“日满学会”，在《康德元年度工作方针》中，直接规定本会的真正使命是，将伪满境内潜流涌动的“反满抗日”思想及习俗改为“爱满亲日”，高唱“五族协和”“日满协和”<sup>①</sup>。可见，这一所谓“学会”全程参与“辅导”那些即将赴日的伪满学生和学成而归的伪满留日学生，而所谓“辅导”其实就是镇压他们的“反满抗日”活动和宣传“爱满亲日”思想。

为“辅导”伪满留日学生和进一步强化日本对伪满教育的影响与控制，在日本与伪满的初等、中等学校的部分校长，以及日本国内教育团体的支持下，满铁出资5万元，于1935年成立了“日满教育协会”，其主要工作分为伪满留日学生的监督辅导、指导日本学生了解伪满情况、日本与伪满之间的教育联络三大部分。具体说来，监督辅导伪满留日学生的工作，包括经营留东学舍，接受约50名伪满留日学生住宿；帮助其他伪满留日学生寻找宿舍；经营以伪满留日学生为对象的日语学校；调查伪满留日学生希望选择的学校、学费等。对于日本学生而言，“日满教育协会”则主要是经营中国语言专修学校，举办关于“满洲事情”的讲演或座谈会。日本与伪满之间的教育联络工作，包括为在伪满的日本人回国和伪满人员赴日教育考察提供方便，利用满铁、军部的摄影活动举办介绍伪满情况的展览，举办在东京的日“满”学生联欢会等。<sup>②</sup>“日满教育协会”以民间组织的形式，发挥着强化“日满一体”“日满融合”的官方作用与影响。

其实，接受强化辅导和相对优待的伪满留日学生，在日本被划定为一个相对隔绝的生活交往圈，无论学习生活还是日常交往均受到日本政府、学校、辅导团体的关注与限制。除了正常的上课和接受辅导外，伪满留日学生稍有“异动”便会引起日本警察的注意。据原伪满留日学生张景柏回忆：“当时警察特别高等科的人经常趁学生上课而搜查，所以长时间养成了自己的东西心里特别有数的习惯，而且那些早期来的留学生也经常提示我们要心中有数……日本警察对留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极其关注。有一个留学生预备校的同学考上了熊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一次在熊本一下车便被日本警察给抓了起来，被关了好几个月，后来才知道是因为看了一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所以我们在日本时期是战战兢兢。”<sup>③</sup>原伪满留日学生吴新也说：“对日本警察的印象最为深刻……在一个星期天，我和几个同学到神户港去玩，在港口附近遇到了一些中国劳工……出于一种对祖国、家乡人的亲近而走近他们想和他们说几句话……为此我们又遭到了警视厅的调查。”<sup>④</sup>可见，日本对伪满留日学生的优待是假，培养“日满融合”的“楔子”是真，但对此不太自信的侵略者，只有依靠调查、监控和暴力维持战时貌似正常的留学教育。

① 参见「十四、日满学会設立計画案 及び 十五、康德元年度工作方針」、『満洲帝国協和会史料 協和会史資料集 第5集 帝制實施前後』、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12120180300、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

② 参见「2(3)日满教育協会概要 昭和八年十二月」、『文化施設及狀況調査関係雑件/在外ノ部』第十三卷、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50161151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资料的名称可能有误，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原文如此。正确的名称应是《2(3)日满教育協会概要 昭和十年十二月》。

③ 刘振生：《“满洲国”時代における元日本留学生と日本》，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294—295页。

④ 刘振生：《“满洲国”時代における元日本留学生と日本》，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289—290页。

### 三 日常生活与调查监控

总体而言，日本对伪满留日学生日常生活的常规性调查与监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利用伪满留日学生会影响留日学生的生活。1936年6月，伪满留日学生会在东京成立，但在该会成立前的三个月就创办了《满洲国留日学生会会报》，目的是提前介入伪满留日学生的生活，以发挥组织动员和协调联络伪满留日学生的作用，但由于各地各校伪满留日学生的分会迟迟未能建立，导致“该会报”往往无各地各校分会的消息可报，且伪满留日学生投稿甚少，只能惨淡经营，勉强维持“定期发行”而已。不过，借助日伪政府要求伪满留日学生参加“夏季修炼”活动，规定凡是因故未参加“夏季修炼”者则必须参加“冬季修炼”，而伪满留日学生会在组织“夏季修炼”“冬季修炼”活动中发挥了组织协调和后勤保障作用。伪满留日学生会从1937年将此前的留日学生“消夏团”改为“夏季修炼”，主要分为海滨修炼、山岳修炼、田园修炼3种形式，即分别到海边、山麓、田园等地的相关场所进行集体修炼活动，每期10天左右。1938年1月，第一次“冬季修炼”在埼玉县秩父町的“秩父织物组合公民道场”进行。据见城梯治统计，此后至1942年，虽然修炼活动的地点、人数等有所变化，但每年都举行修炼活动，目前由于史料缺失，无法确认1943年后是否继续举办修炼活动。<sup>①</sup>

其实，无论是否继续举办修炼活动，伪满留日学生对留日学生的影响力与控制力都逐渐弱化。例如，1942年3月是伪满“建国”10周年，伪满特派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赴日“谢恩”，伪满驻日大使馆要求居住在东京的伪满留日学生全部参加相关活动，但除了伪满留日学生会馆居住者外，东京市内居住的约500名伪满留日学生中仅有10名参加，而在张景惠访问伪满留日学生会馆时，除了在会馆居住者中有111名参加外，会馆外居住者竟无人参加。由此可见伪满留日学生会的联络协调和组织动员能力之弱，无法指望他们影响和监控其他伪满留日学生的学习生活与日常交往。

二是对伪满留日学生的常规性调查与监控。例如，1933年6月27日，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部长坪上贞二致函北海道大学校长南鹰次郎等12所大学的校长，请他们调查本校伪满留日学生的姓名、省别、部科、年级，以及入学年月、学业成绩表、是否缺席等情况。<sup>②</sup>1936年2月17日，驻新京代理总领事同时致函外务大臣广田弘毅、驻伪满大使植田谦吉，报告该馆警察署署长调查的伪满在外留学生的情况，包括在北平、上海、德国、日本各地留学的“满洲国”人的留学地、留学学校、年龄、性别、原籍住所、出身学校、留学时间等<sup>③</sup>，非常具体细致。为配合伪满的留学生认可制度和所谓“指导训育”，1937年5月14日，外务省向文部省转达了伪满请求调查其留日学生的请求。1938年3月9日，文部次官伊东延吉致函外务次官堀内谦介，通报了1937年5月调查的中等学校、小学、青年学校、青年学校教员养成所等其他各校在读的伪满留日学生人数及相关情况。<sup>④</sup>1938年4月27日，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部长蜂谷辉雄致函东京帝国大学校长长兴又郎等110所学校及教育机构负责人，要求按照“学部及科别、年级、国别、省别、姓名”

① 参见见城梯治：「戦時下日本における『満洲国』留学生たちの『修練』活動——『満洲国』留日学生会会報から見る日本体験の一側面」、千葉大学『人文研究』第46号、2017年3月。

② 参见「4. 満洲国留学生ニ関シ調査照会ノ件 昭和八年六月」、『在本邦留学生関係雑件』第九卷、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50154064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③ 参见「11. 満洲国人人子弟ノ在外留学者調 昭和十一年三月」、『在本邦留学生関係雑件』第九卷、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50154071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④ 参见「3. 満洲国留学生調査方ノ件 昭和十二年五月」、『在本邦留学生調査関係雑件』第八卷、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50161351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的模式，调查伪满及伪中华民国的留日学生。<sup>①</sup>

日本各校及各地方政府也根据外务省、文部省、内务省等机构的要求，及时报告本地区或本校伪满留日学生的情况与“动向”。例如，1939年6月19日，大阪府知事池田清致函内务大臣木户幸一、外务大臣有田八郎、文部大臣荒木贞夫，以及警视厅、北海道、神奈川、爱知、福井、京都、滋贺、奈良、三重、和歌山、兵库、山口、福岡、长崎各厅府县长官（及其下辖各警察署署长、县各水上警察署署长），报告该府辖区有伪满留日学生32名，伪中华民国留日学生25名，合计57名，指出在目前中日战争形势下密切关注他们的“动向”，“没有特别嫌疑之言行，均安心求学中”，并随函附送“满中留学生一览表”，包括他们留学校名、姓名、年龄、出身地、学费、住所、经历及动向。<sup>②</sup>8月25日，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部长三谷隆信致函东京帝国大学校长平贺让等22所大学及教育机构的负责人，请他们调查文化事业部补助的留日学生在暑假期间是否回国，根据他们9月是否返校决定补助学费与否。9月6日，东北帝国大学校长本多光太郎复函三谷隆信，报告本校的留日学生孙经灏、陈志藻，均于9月1日返校上课，且他们暑假期间未归国，并经常到校研究从事研究。<sup>③</sup>可见，从学校到日本各地政府，再到文部省、内务省、外务省、警视厅等机构，始终关注留日学生的学习与日常，监控他们的一举一动，以致留日学生张景柏时刻感到被监视，留下严重的心理阴影。<sup>④</sup>

三是与伪满驻日使领馆“合作”监督留日学生。其实，伪满驻日使领馆监督留日学生也是日本方面的要求。1932年11月6日，日本与伪满就“对满文化事业”举行“恳谈会”，外务省的江户书记官提出有必要设置“满洲国”留学生监督，且鉴于此前中华民国驻日留学生监督在公使馆之外的种种不便，希望“满洲国”留学生监督成为驻日代表工作的一部分，“满洲国”方面表示赞成。<sup>⑤</sup>1935年2月19日，伪满外交部、文教部颁布《暂行满洲帝国驻日公使馆学务处规程》，规定在伪满驻日公使馆内附设学务处，在伪满驻日公使监督下，处理伪满留日学生的指导、监督、保护，以及其他一切留学事务，而“学务处长由驻日公使馆参事官（参事官缺员时得由秘书官充之）中，经外交部大臣与文教部大臣协议后所指定者充任之”，“学务处限于所管事项之文书，得与文教部直接办理，但有必要时应录案分呈外交部大臣”<sup>⑥</sup>。形式上由伪满文教部、外交部共同管理留日学生。1936年9月，伪满颁布《留学生之件》《留学生章程》后废止学务处，改由驻日大使馆直接指导和监督留日学生<sup>⑦</sup>，但实际上一切重要事务都经由外务省、文

① 参见「3. 满洲国並支所留学生在籍者ニ関スル件 昭和十三年四月」、『在本邦留学生調査関係雑件』第十一卷、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50161417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② 参见「9. 满洲国並中華民國留學生ノ動靜ニ関スル件 昭和十四年六月」、『参考資料関係雑件/学校及学生関係』第七卷、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50161773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③ 参见「2. 満支留學生出席者調ノ件 昭和十四年八月」、『在本邦留学生調査関係雑件』第十三卷、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50161433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④ 参见刘振生：《“满洲国”時代における元日本留學生と日本》，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294页。

⑤ 参见「1. 满洲国留學生ニ対シ給費制度ニ関スル件 昭和八年一月」、『在本邦留学生関係雑件』第九卷、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50154061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⑥ 「7. 满洲国駐日学務處規定 昭和十年二月」、『在本邦留学生関係雑件』第九卷、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50154067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⑦ 参见阿部洋：『「対支文化事業」の研究——戦前期日中教育文化交流の展開と挫折』、汲古書院、2004年、839頁。



部省、内务省、陆军省等机构，即在留日学生管理上伪满依然是傀儡。

尽管日本政府、军部、学校、警察、社会团体联合伪满驻日使馆、伪满留日学生会等监控伪满留日学生的学习、交往、思想动态等，迫使大部分伪满留日学生不得不“安心”学习和强颜欢笑，但无法从内心深处清除他们的反“满”、抗日、爱国之情。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外事警察就提醒日本政府和军部对伪满留日学生和滞留在日本的中华民国留日学生要特别警惕，认为中国留日学生比一般劳动者和商人有着更明显、更强烈的国家意识。1939年，“中国共产党东京支部事件”发生后，日本警察逮捕36名“满”中留日学生。对此心有余悸的日本警察认为，这些留日学生内心怀强烈的抗日意识，“我们无法想象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举动，因此有必要特别注意对留学生的视察与取缔”。1941年3月，东京发生了“满洲国留学生左翼团体事件”，在6名嫌疑的伪满留日学生中有5名居住伪满留日学生会馆。他们以伪满留日学生会馆为据点，在会馆内开会商讨抗日计划，甚至准备利用《满洲国留日学生会会报》进行左翼宣传。<sup>①</sup>因而，在日伪严密监控中，伪满留日学生仍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暗中进行抗日活动。

总之，原伪满留日学生的受访者，因个人体验、战争经历、年龄性别、生活境遇等不同，所谈的留日生活差异较大，有的对那段留日生活充满恐惧、充满懊悔，有的回忆战时留日生活所受歧视与不快，有的感慨毕竟在日学习了以后服务于新中国的知识和技术，有的只是“埋头读书”等<sup>②</sup>，各有不同，但我们不宜以某个人的留日生活否定另一个人的留日生活的真实性，因为每个人所谈的留日生活对个人而言都是相对真实的，体现了个人留日生活的特殊性。但是，个人留日生活的特殊性蕴含于伪满留日学生在日生活的普遍性之中。无论伪满留日学生的个人在日生活如何，作为日本在中国大陆较早扶植的傀儡政权的留日学生，被日本寄予“日满融合”的期望，在一定范围内享受着相对优待和学席名额，从政策上貌似优于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与其他伪政权留日学生。其实，这只是日本妄图并吞中国东北和实施“以华制华”“分而治之”政策在留日教育层面的反映，本质上并无区别。伪满留日学生的日常生活同样被调查、被监控，甚至稍有“异常”即可能招致牢狱之灾或杀身之祸，这也是他们留日生活的常态与底色。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

本文责编：杨卓轩

① 参见「中国留学生」内務省警保局編：『極秘 外事警察概況』第3卷、1937年、49—50頁；「中国共产党東京支部檢挙狀況」内務省警保局編：『極秘 外事警察概況』第5卷、1939年、26頁；「留学生の状況」内務省警保局編：『極秘 外事警察概況』第6卷、1940年、24頁；「満州国留学生左翼グループ事件」内務省警保局編：『極秘 外事警察概況』第7卷、1941年、68—71頁。转引自孫安石、大里浩秋編著：『中国人留学生と「国家」、「愛国」、「近代」』、東方書店、2019年、246頁。

② 参见刘振生：《“満洲国”時代における元日本留学生と日本》，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283—312頁；周一川：《近代中国女性日本留学史（1872—194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63—266頁。